

# 抗战时期苏联援助中共武器问题初探

孙艳玲

**内容提要** 抗战时期苏联对中共的武器援助问题是苏联与中共关系史上一个悬案,一般认为中共没有从苏联那里直接得到武器援助。现根据有关档案材料可初步肯定,苏联确曾秘密援助过中共一些武器和军事装备,但援助不仅数量极少,所起的作用也有限。

**关键词** 抗日战争 苏联 中国共产党 武器援助

抗日战争时期苏联是否向中国共产党提供了武器援助是一个历史悬案。多年以来,由于档案资料的限制,学者很难对这一问题进行较系统的研究。一般认为,抗战期间中共没有从苏联那里直接得到武器<sup>①</sup>;也有个别学者指出,中共与八路军还是得到过一些苏联武器,但论述不详。<sup>②</sup>笔者通过研究俄罗斯、中共及台湾方面的档案文献<sup>③</sup>,从中发现了不少有关这一问题的线索。根据这些档案文献得出的初步结论是:抗战期间苏联确曾秘密援助过中共武器和军事装备,援助主要集中在抗战前期,不过援助数量极少,所起的作用也有限。本文拟根据现有文献对中共寻求武器援助和苏联提供援助的过程进行初步梳理,并作简单分析。

## 一、抗战前期苏联向中共提供武器援助情况

苏联考虑向中共提供武器援助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大革命失败初期,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援助计划始终未能实现。抗战全面爆发后,尽管困难重重,苏联还是应中共的请求设法秘密提供了一些武器援助。

大革命失败后,国共关系破裂,苏联与国民党关系也全面恶化,在此情况下苏联开始考虑向中

<sup>①</sup> 参见王真《抗战时期苏联与中共关系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6期,第196—200页;张泽宇:《全面抗战时期苏联和共产国际对中共的援助研究》,《中共党史研究》2011年第8期,第73—74页。

<sup>②</sup> 参见徐万民《战争生命线——国际交通与八年抗战》,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39—144页;李嘉谷:《合作与冲突——1931—1945年的中苏关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14页。

<sup>③</sup> 参见 ВКП(б), Коминтерн и Китай: Документы/Т. V. ВКП(б), Коминтерн и КПК в период антияпонской войны. 1937—май 1943/Ред. коллегия: М. Л. Титаренко, М. Лётнер и др. - М.: Российская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2007; 伍修权:《我的历程(1908—1949)》,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5编,“中共活动真相”(3),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5年版;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第7册,台北,兰溪出版有限公司1980年版。

共提供武器,帮助中共开展武装斗争。1927年8月,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向中共提供一批武器<sup>①</sup>;1928年4月,共产国际又建议苏联军事部门采取措施立即将军事装备运往暴动地区<sup>②</sup>,但有关计划并没能实施。此后,由于国民党对红军的围追堵截及1934年中共与莫斯科电讯联系的中断,武器援助并不具备条件。长征结束前后,这一问题被再次提出。1935年11月,张浩回国前,斯大林曾表示:如果中国红军能够控制新疆和甘肃河西一带地区,苏联将予以必要的军火供应。<sup>③</sup>1936年6月,在与莫斯科电讯联系恢复后,中共也立即向苏联和共产国际提出了武器援助的请求。<sup>④</sup>9月初,斯大林批准了对中共军事援助的方案,同意红军攻占宁夏后在当地接收武器。<sup>⑤</sup>但是,由于宁夏战役未能完成等原因,该方案未能实现。西安事变后,国民党的“剿共”政策基本结束,中共开始派代表同国民党就合作抗日举行谈判,苏联也把对华政策的重点转向推动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在这种形势下,中共对于武器援助问题暂不迫切。

抗战全面爆发后,出于对日作战的需要,中共对武器的需求非常急迫。为此,抗战初期中共多次要求国民党“发给平等待遇之补充器物”,然而蒋介石并不愿意分配给中共武器。<sup>⑥</sup>此外,中共还积极发展自己的兵工制造,但由于初创阶段的兵工技术落后、产量较低,武器缺乏问题并不能在短期内迅速缓解。<sup>⑦</sup>

为解决武器问题,中共把重点转向争取苏联的武器援助。1937年10月,中央派周小舟赴新疆与盛世才联络,其任务就包括与盛及苏联驻新代表接洽如何接济红军军械军饷问题。<sup>⑧</sup>周小舟到达迪化(即乌鲁木齐)后将情况转达给陈云等人。10月23日,陈云等致电毛泽东、张闻天表示,“对各种武装及技术干部和钱、衣服的帮助,已电国际请求”。<sup>⑨</sup>此后,中共又多次通过不同方式向苏联提出武器援助问题。1938年2月2日,康生在与第二次访问延安的苏军代表安德利阿诺夫会谈时明确提出中共需要“建设自己的国防工业”的问题,并希望共产国际能够提供经费让中共及时购买武器。<sup>⑩</sup>2月3日,毛泽东也与安德利阿诺夫谈了武器和武装问题,并向伏罗希洛夫提出资金和武器的要求。<sup>⑪</sup>1938年3月底被中共中央派到莫斯科的任弼时,又提出了关于武器援助的问题。<sup>⑫</sup>5月8日和17日,任弼时在向共产国际作补充报告时,指出了八路军目前的一些困难:1. 武器缺乏,许多新兵现在还是徒手,或者拿着手榴弹去参加战斗;2. 武器性能非常落后,没有重武器、大炮、坦

①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苏维埃运动》第7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6页。

②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苏维埃运动》第7卷,第398页。

③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1年版,第296页。

④ 《中央书记处致王明、康生电》(1936年6月16日)、《洛甫、恩来、博古、泽东关于红军行动方针给王明同志电》(1936年8月25日),转引自杨奎松《共产国际为中共提供财政援助情况之考察》,栾景河主编:《中俄关系的历史与现实》,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62页。

⑤ 季米特洛夫著,马细谱等译:《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6页。

⑥ 尽管蒋介石在战势危急的情况下对中共的要求“此时惟有顺受之”,同意拨给中共部分武器和款项,但实际上抗战初期国民党对八路军并无枪炮等补充,仅给了少数弹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3、17、59页;蒋介石:《国史回忆》,1937年8月27日条,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转引自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383页。

⑦ 薛幸福主编:《陕甘宁边区》,兵器工业出版社1990年版,第11—45页;顾龙生编著:《毛泽东经济年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117页;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93页。

⑧ 《周小舟去新疆的任务》(1937年10月4日)。

⑨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文集》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59页。

⑩ ВКП(б), Коминтерн и Китай. Документы Т. V., №14, С. 86—87。

⑪ ВКП(б), Коминтерн и Китай. Документы Т. V., №15, С. 88—93。

⑫ 徐则浩:《王稼祥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版,第293页。

克和飞机。<sup>①</sup>

在中共的积极请求下,同时也基于中共抗战的实际需要,苏联开始准备援助中共。在这一过程中,苏联考虑到当时敏感的国共关系,希望把国共两党视作一个整体,将对中共的援助纳入整个对华援助中。当时,苏联设想了三种方式。

一是帮助援建军事工业。1937年11月11日,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回国前,斯大林会见了代表团成员王明等人。会谈中,斯大林指出,为了坚持抗战必须创建自己的军事工业,并表示准备提供制造飞机和坦克的材料,准备提供设备和技术人员帮助建立兵工厂等。<sup>②</sup>但笔者认为,斯大林的这一承诺并不是仅针对中共,恐怕更多地是针对国民政府,事实上当时苏联正在同国民政府商谈帮助中国援建飞机制造厂和炮厂等事宜。<sup>③</sup>1939年3月,中共曾提出请共产国际派专家以塔斯社记者的身份来华帮助指导武器生产。<sup>④</sup>同年8月,共产国际一个专门研究中国问题的小组也曾建议帮助八路军有效组织弹药生产。<sup>⑤</sup>但是,由于战时的实际情况,这一设想并没有真正实现。

二是打算根据其与国民政府达成的协定,从给国民党的武器援助中划拨出一部分给中共。有俄罗斯学者撰文指出,1937年9月14日,作为对《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补充,中苏两国政府就苏联以贷款结算的形式向中国提供武器、弹药和装备问题达成协议,其中特别约定,苏联所提供武器的1/4或1/5必须分配给中共指挥的军队。<sup>⑥</sup>另据王明回忆,1937年12月他在回延安后参加的第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转达了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的承诺:“现代化武器装备的来源,将从苏联支援中国国民革命军的武器中抽五分之一至四分之一,关于这一点,早已与蒋介石达成了协议。”<sup>⑦</sup>然而,这一协议的内容并没有相关档案可以证明。而且,即使真有此约定,它在事实上也未能执行。当时,针对国民政府只给中共衣物和少数弹药,并无枪炮等补充的情况,苏联曾几次干预,但收效甚微。1937年11月18日,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在接见国民政府代表团杨杰等人时敦促国民党补给八路军武器。<sup>⑧</sup>1938年孙科访苏期间,苏方又就国民党“对八路军待遇未公”、对中共存有“歧视”等向孙科表示不安。<sup>⑨</sup>即便如此,国民政府不过从“军队统帅部”分配给中共大概120挺轻机枪和6门反坦克小炮等苏联武器,1940年弹药接济也停止了。<sup>⑩</sup>

三是希望通过公开的途径直接向中共提供武器援助。1937年12月,伏罗希洛夫在会见国民政府访苏代表杨杰时明确表示:“苏政府欲给第八军野炮廿四门、防战车炮廿门、机关枪六十架、战

① ВКП(б), Коминтерн и Китай. Документы Т. V., №18, С. 107—130;《五月十七日任弼时关于四月十四日报告大纲的说明和补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任弼时年谱(1904—1950)》,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70—371页。

② ВКП(б), Коминтерн и Китай. Документы Т. V., №7, С. 74—75;季米特洛夫:《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第59—60页;徐则浩:《王稼祥传》,第289页;王明:《中共50年》,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218页。

③ 李嘉谷:《合作与冲突——1931—1945年的中苏关系》,第110—113页。

④ ВКП(б), Коминтерн и Китай. Документы Т. V., №33, С. 185。

⑤ ВКП(б), Коминтерн и Китай. Документы Т. V., №63, С. 310。

⑥ А. Картунова. К завершению издания серии сборников документов “ВКП(б), Коминтерн и Китай” 1920—май 1943 гг. //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2008. №1. С. 114。

⑦ 王明:《中共50年》,第217—218页。

⑧ Ледовский А. М., Мировицкая Р. А., Мясников В. С. (сост.)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X веке. Т. IV: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1937—1945 гг. / Отв. ред. Тихвинский С. Л. М.: Памятники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мысли, 2000., Кн. 1, №121, С. 151—156。

⑨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3编,“战时外交”(2),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1年版,第409页。

⑩ 《中共抗战一般情况的介绍——一九四四年六月二十二日第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与中外记者参观团的谈话》,《解放日报》,1944年8月10日,第4版;ВКП(б), Коминтерн и Китай. Документы Т. V., №99, 142, С. 403, 467;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5编,“中共活动真相”(1),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5年版,第309页。

车十五辆、飞机十架”，如蒋介石许可，即赠与，但最后因未得蒋介石同意而作罢。<sup>①</sup>此后，考虑到蒋介石的反对，苏联基本放弃了这一想法。1938年7月初，季米特洛夫同即将回国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稼祥等人谈话，据王稼祥回忆，由于担心引发国民党政府可能出现不利于中共的“重大变化”，季米特洛夫并未应允直接向八路军援助武器。<sup>②</sup>

这样，由于战时的特殊情况和蒋介石的反对，苏联设想的三种公开援助方式均未能实现。

在考虑公开援助方式的同时，苏联也在准备采取秘密方式向中共提供武器援助。事实上，在后来公开援助无法实施的情况下，这就成为苏联向中共提供武器援助的唯一途径。

秘密援助之门的开启是从抗战初期苏军代表对延安的一次访问开始的。1937年11月26日至30日，苏军代表安德利阿诺夫第一次访问延安，在途经新疆期间他把从新疆督办盛世才那里收到的6挺带高射瞄准器和6万发子弹的马克沁重机枪及10挺带2万发子弹的捷格加寥夫轻机枪成功运抵延安。据此，他向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建议：“以督办的名义、利用我们的线路（督办的运输条件非常有限），间断地向延安运送小批量的武器是完全可能的。”<sup>③</sup>另据一份材料指出，稍后王明等人回国时，在其乘坐的飞机上也装载了给延安的武器和物资。<sup>④</sup>

恰好这时苏联政府给国民政府的各种援助开始通过经新疆的国际公路和国际航空线<sup>⑤</sup>运送，因此抗战初期苏联秘密援助中共的物资就利用了这条线路。由于抗战初期国民政府无力顾及交通运输，“故中苏贸易物资最初是由苏联汽车直运兰州”，直到1938年冬国民政府才组织起特运车队，1939年3月苏联汽车不再进入甘肃境内。<sup>⑥</sup>曾任苏联驻华外交官的A. M. 列多夫斯基指出，苏德战争爆发以前，苏联的“人员、车队入境，从苏联向新疆或相反方向运送物资实际上不受中国当局控制。来自苏联运送武器的车队也畅通无阻”。<sup>⑦</sup>在这一过程中，八路军驻新疆和兰州办事处承担了莫斯科与延安之间军火物资的中转任务。<sup>⑧</sup>据曾任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处长的伍修权等回忆，从苏联长途运来的物资和军事装备，由办事处负责接收和转运，有时只经过兰州，仍由原车运出兰州送到解放区，办事处只派人押送和领路，西兰公路有一段正好通过陕甘宁边区所管的长武县境，车辆开到那里后，就将物资卸下交给驻守在当地的八路军部队，再由他们经庆阳送到延安。<sup>⑨</sup>如办事处的副官况步才等人就曾数次押运军火物资到陕西长武转交驻庆阳的八路军。<sup>⑩</sup>关于这条运输线苏联军事总顾问切列潘诺夫曾说过：“这条运输线的最后一段距中国共产党人控制的地区

①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3编，“战时外交”（2），第469—470、505—506页。

② 徐则浩：《王稼祥传》，第296—297页。

③ Доклад В. Андрианова о поездке в Особый район Китая, 根据俄罗斯学者索特尼科娃在俄罗斯档案馆对《安德利阿诺夫访问中国特区报告》的手抄记录。

④ 徐万民：《战争生命线——国际交通与八年抗战》，第144页。

⑤ 国际公路是西北国际交通线的主干，从中亚直达西安，分西安—兰州段（简称西兰公路）、兰州—星星峡段（简称甘新公路）、星星峡—霍尔果斯段、霍尔果斯—萨雷奥捷克段。除陆路外，西北当时还有兰州、酒泉、哈密、乌鲁木齐等航空站，最初大部分苏联飞机从阿拉木图—乌鲁木齐—兰州线抵达，后来又开通了中苏民航线。徐万民：《战争生命线——国际交通与八年抗战》，第25、90—92、97、101页；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X веке. Т. IV, Книга 2, комментарий 1 к док №31, С. 581—582。

⑥ 杨再明：《抗战时期的中运会》，王佳贵主编：《盟国军援与新疆——新疆文史资料》（第24辑），新疆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6页。

⑦ A. M. 列多夫斯基著，陈春华、刘存宽等译：《斯大林与中国》，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220页。

⑧ 陈秀玉：《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综述》，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党史工作委员会、中共乌鲁木齐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新疆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10页。

⑨ 伍修权：《我的历程（1908—1949）》，第136—137页；康海生：《八路军兰州办事处的一些情况》，《革命回忆录》（第16辑），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44页。

⑩ 全士英、吴维民：《抗战后方的八路军驻甘办事处》，甘肃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25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89页；谢觉哉：《谢觉哉日记》，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59、260、267页。

较近,因而,中国共产党人首先深受其惠。”<sup>①</sup>

这样,从1937年底起,苏联开始通过新疆这条线路向中共提供武器援助。具体接运武器事宜由延安驻新疆代表与苏联领事商洽。<sup>②</sup> 根据新疆督办公署档案和国民政府警务处档案《中共活动案卷》记载:1937年底至1938年,苏联向中共提供了一定数量的武器。如,1937年12月21日,“苏俄军车五辆,载纸张、白糖、步枪十五箱、子弹三十一箱,交八路军办事处收转”;1938年2月16日,“有军车十六辆,全系步枪、轻机关枪、炮弹、手榴弹等,另有通讯器材一车,押车武装士兵二十一人至迪化”;1938年5月30日,“苏俄军车二十五辆,武器弹药、货物、食品等交八路军办事处转”;1938年5月初到6月初,“苏联接济延安军车未经督署顾问登记者”,“共有三次五十一辆,装载物品不详,均系编号之木箱,大小不等可能系武器,直接入关”。<sup>③</sup> 这一时期还有很多档案记载没有具体时间,如“有苏联军车八辆,装载弹药、药品、木箱等。押车人为帕思洛夫斯基,其称为友党运送药品”;“苏联军车七辆开入八路军办事处过夜,据说明日入关,蒙古人古鲁巴尔司机说:除子弹外,大都是机关枪”等。<sup>④</sup>

从1938年中期开始,国民党逐渐加紧了对苏联军运车队行驶区间的限制,先是不许超越兰州,后来又不许超越哈密。同时,蒋介石也严密监视苏联在华人员,加强对根据地的交通管制,试图切断中共与苏联的联系,防止苏联以“军用品、武器接济陕甘宁边区政府”。<sup>⑤</sup> 因此,从1938年下半年开始,苏联对中共的武器援助受到很大影响。此后至1940年初,在现有档案中,笔者仅发现两次苏联对中共武器援助的线索。一是1939年1月8日,季米特洛夫在给伏罗希洛夫的信中写道:根据我们的要求,米高扬拨给我们大约15吨的各种军事物资和文化用品以供八路军和特区所需。请尽快转运给八路军。<sup>⑥</sup> 但由于找不到相关的其他档案,军事材料具体是什么、是否最终送出以及何时送到,目前还不得而知。二是据国民党方面的档案记载,1940年1月,“苏俄曾用‘新盛’名义运军火三十六辆至延安”。<sup>⑦</sup> 同样,这一情况也有待其他相关档案资料的证实。

总之,尽管以上各项援助还需要多方证据加以进一步证明,但依据现有档案和材料基本可以确定,1937年底至1940年初苏联确实通过新疆这一线路向中共援助了一些武器。

## 二、皖南事变前后苏联提供武器援助的情况

皖南事变前夕,苏联和共产国际为了阻止蒋介石投降和分裂统一战线,曾一度同意向中共提供武器,并为此作了一定准备。皖南事变爆发后,尽管中共要求武器援助的愿望更加强烈和迫切,但苏联和共产国际却不再同意提供武器援助了。

1940年下半年,针对蒋介石日益表现出的反共和投降的迹象,中共开始准备自卫。为争取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支持,11月初,毛泽东致电季米特洛夫等人详细通报了对国内形势的判断,同时提出,为防止日军和蒋介石共同向中共进攻,“在我取退让态度彼仍坚持进攻之时,我们拟举行自卫

① 亚·伊·切列潘诺夫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译:《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一个驻华军事顾问的札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89页。

② 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第7册,第3999页。

③ 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第7册,第3999—4000页。

④ 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第7册,第4000—4001页。

⑤ 张严佛:《抗战前后军统特务在西北的活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64辑),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89页;ВКП(б),Коминтерн и Китай. Документы Т. V., №15, С. 93。

⑥ ВКП(б),Коминтерн и Китай. Документы Т. V., №28, С. 180—181。

⑦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5编,“中共活动真相”(3),第69页。

的反攻”。<sup>①</sup>

苏联和共产国际并不认为蒋已彻底投降日本,也不同意中共首先发起攻势<sup>②</sup>,但为了在蒋发动进攻时增加中共军队的战斗力,还是表示可以向中共提供武器。11月27日,季米特洛夫致电毛泽东表示:“如果您能保证你们地区与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间的交通安全,我们可以向你们提供大量武器。请尽快认真研究这个问题,并告之你们的想法和具体意见。”<sup>③</sup>11月30日,毛泽东电告季米特洛夫说,实行自卫措施“目前只是准备性的,需要等待国际和国内政治条件的成熟,大约在6个月之后将急需能够用来摧毁碉堡的大炮,为此目的也可以使用反坦克炮。目前我们有6门这样的炮,但炮弹很少。希望给予必要的支持。此外,我们的重机枪、材料和电力设备等也极度缺乏”。<sup>④</sup>

在共产国际明确表示同意向中共提供武器后,双方开始对武器援助、特别是线路和方式问题进行协商。当时,由于新疆形势的恶化<sup>⑤</sup>,以及蒋介石决定停止由苏联承运西北运输线<sup>⑥</sup>,双方决定把经新疆的西北线改为经北线,即蒙古—绥远的线路进行运输。<sup>⑦</sup>12月18日,毛泽东致电季米特洛夫,详细通告了中共中央对通过蒙古转运武器的三个方案:第一种比较隐秘和安全,可以运送少量但急需的,即从绥远游击区秘密派遣少量灵活有战斗力的骑兵队到蒙古边界接收武器并运送到绥远游击区,而后由武装力量转运到晋西北。第二种可以运送大量各式武器,要求筹备一个能够深入平绥铁路以北游击区的较大的部队。第三种是通过收买傅作义,把各种大型武器从蒙古直接运送到陕甘宁边区。其中,第二方案容易暴露,可能在外交和国共关系上引起麻烦;第三方案,从现在采取措施到有肯定结果需要半年;而第一方案,在明年3月底就可以完成布置,4月就可以开始接收和转运。<sup>⑧</sup>12月26日,季米特洛夫与苏联国防人民委员铁木辛哥谈了援助八路军武器问题。<sup>⑨</sup>

根据现有材料判断,中共有可能从这条线路得到了武器。据国民党方面的档案记载:中共“开辟路线,由陕北三边经伊盟、桃力民至大青山,与外蒙联络”,苏俄“用汽车密送物资至延安”。<sup>⑩</sup>1941年4月24日第二战区长官部参谋长朱绶光呈送蒋介石的密电称,中共“自苏联有由大青山、经内蒙打通路线之企图,并取得现款枪弹大炮等接济等情”。<sup>⑪</sup>另据当年苏联红军汽车驾驶员依·戈·明卡回忆:“1939年或者是1940年,我已经记不太清楚了,我们接受了运送武器到内蒙的任务。这些武器是送给中国红军的,有机枪、步枪、子弹、手榴弹以及飞机油”,经过长途跋涉,最终

<sup>①</sup> ВКП(б), Коминтерн и Китай. Документы Т. V., №135, С. 457—458;《毛泽东给季米特洛夫、曼奴依尔斯基的信》(1940年11月4日)。

<sup>②</sup>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473页;ВКП(б), Коминтерн и Китай. Документы Т. V., №138, С. 461。

<sup>③</sup> ВКП(б), Коминтерн и Китай. Документы Т. V., №141, С. 465。

<sup>④</sup> ВКП(б), Коминтерн и Китай. Документы Т. V., №142, С. 467—468。

<sup>⑤</sup> 《陈潭秋关于新疆情况给中共中央的报告(1939年11月28日)》、《陈潭秋关于新省一年来情况给中共中央的报告(1940年6月20日)》,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党史工作委员会、中共乌鲁木齐市委员会党史工作委员会编:《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第28—29、38—42页。

<sup>⑥</sup> 杜聿明:《中国远征军入缅对日作战述略》,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8辑),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4—5页;王晚:《哈密中运会概略》,王佳贵主编:《盟国军援与新疆——新疆文史资料》(第24辑),第81页。

<sup>⑦</sup> 事实上,早在1940年春中共与共产国际就已经开始考虑并多次协商改用新线路的问题。ВКП(б), Коминтерн и Китай. Документы Т. V., №№117、121、129、130, С. 435、439—440、447、448。

<sup>⑧</sup> ВКП(б), Коминтерн и Китай. Документы Т. V., №144, С. 469—471。

<sup>⑨</sup> 季米特洛夫:《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第118页。

<sup>⑩</sup>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5编,“中共活动真相”(3),第69页。

<sup>⑪</sup>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5编,“中共活动真相”(3),第76—77页。

将武器交给当地部队。<sup>①</sup> 根据对前后情况的分析,如果有这次援助的话,那么很可能是在1940年底。

就在苏联和共产国际准备向中共提供武器援助时,皖南事变爆发了。鉴于局势的变化,中共“决定在政治上军事上迅即准备作全面大反攻”<sup>②</sup>,同时更加强烈地要求共产国际和苏联提供武器援助。1941年1月14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季米特洛夫,表示“准备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给予蒋介石所实行的这种广泛的进攻以有力的反攻”。<sup>③</sup> 同时,毛泽东还致电周恩来:请周恩来“与崔可夫<sup>④</sup>切实一谈,五月后他们有何办法援助我们夺取兰州,我们缺乏重武器及使用武器的技术人员,如没有飞机及攻城部队,夺取兰州及甘、凉、肃三州是不可能的,而这一问题迟早必须解决,蒋介石反革命是确定了的,请问崔可夫何种时机他们可以公开援助我们”。<sup>⑤</sup> 1月21日,中共中央在给季米特洛夫的电报中,请求转告斯大林,“能否于今年秋冬,或者明年春天向我们提供具体的军事援助”。<sup>⑥</sup> 2月1日,毛泽东致电季米特洛夫,强调“破裂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了。在彻底破裂之后,蒋介石肯定要向日本投降。那时我们无疑将会处境艰难,受到来自日本和蒋介石两个方面的打击。如果那时你们不能公开援助我们,那我们的困难将是很大的”。<sup>⑦</sup>

尽管中共的态度如此坚决,但苏联在看到蒋介石关于维持国共关系和坚持抗战的表态<sup>⑧</sup>后却不再考虑向中共提供武器了。2月4日,季米特洛夫致电毛泽东明确表示,国共两党的“破裂不是不可避免的”,你们“要依靠主张维护统一战线的群众,尽共产党和我们军队所能作出的一切努力,来避免内战的爆发”。<sup>⑨</sup> 同时,为了防止国共两党分裂和内战,苏联在暂停对国民政府武器供应的同时,也不再准备向中共提供武器了。2月9日,周恩来向毛泽东通告了崔可夫转达的意见:第一,斯大林不愿意听到国共两军冲突事,要团结抗战;第二,关于军火,苏联接济的军火,中共可向国民党要求补给。<sup>⑩</sup> 这样,皖南事变后中共要求苏联提供军事援助一事就此搁浅。

### 三、苏德战争爆发后双方关于武器援助问题的协商

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后,在苏联请求中共采取军事行动配合作战的背景下,双方多次协商过武器援助问题。其间,为了让中共派兵开赴“南满”牵制日军、配合苏军作战,斯大林还曾主动提出要中共到满蒙边境接受苏联武器。

最初,中共提出武器援助请求是为了协助苏联牵制日军。1941年6月底至7月初,为防备日

① 依·戈·明卡:《光荣的使命》,王佳贵主编:《盟国军援与新疆——新疆文史资料》(第24辑),第159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257页;中央档案馆编:《皖南事变(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146页。

③ ВКП(б), Коминтерн и Китай. Документы Т. V., №145, С. 471—472.

④ 崔可夫时任苏联驻华武官和蒋介石的总军事顾问。

⑤ 周文琪、褚良如编著:《特殊而复杂的课题——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关系编年史(1919—1991)》,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请问崔可夫他们何时公开援助我们》(1941年1月)。

⑥ ВКП(б), Коминтерн и Китай. Документы Т. V., №149, С. 480.

⑦ ВКП(б), Коминтерн и Китай. Документы Т. V., №152, С. 483—484.

⑧ ВКП(б), Коминтерн и Китай. Документы Т. V., №148, С. 478;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X веке. Т. IV, Книга 1, №470, С. 629—632;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3编,“战时外交”(2),第387页。

⑨ ВКП(б), Коминтерн и Китай. Документы Т. V., №153, С. 485.

⑩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491—492页。

本从东线袭击、造成苏联腹背受敌,斯大林通过几个渠道请求中共派兵配合作战牵制日军。<sup>①</sup>在认真分析各种情况后,毛泽东向苏联、共产国际通报了中共的想法和举措,并借机提出了武器援助的问题。7月15日,毛泽东致电在重庆的周恩来,请他告诉崔可夫并请他转告远方朋友(即共产国际和苏联领导人——作者注),“我们决心在现在条件下以最大可能帮助苏联红军的胜利。但由于日寇在华北已占据四年了,对大城市铁路矿山等已建筑坚固工事,且敌我军事技术装备悬殊太远,我人力、物力、地区、弹药日益困难,假若日本进攻苏联时,我们在军事上的配合作用恐不很大”,“因此我们采取巩固敌后根据地,实行广泛的游击战争,与日寇熬时间的长期斗争的方针”。同时表示:“如果我们能加强弹药、机关枪、大炮和炸药的装备,我们的行动效力就当更大些。尤其是步枪子弹等于至宝,因我们每枪平均只有二十发,机关枪极少,炮则更少,爆炸的黄色火药亦得不到”。<sup>②</sup>7月18日,中共中央致电季米特洛夫,再次强调了上述内容。<sup>③</sup>收到电报后,季米特洛夫特别向斯大林和莫洛托夫请求给予中共“一定数量的弹药,以便对日本可能采取的反对苏联的行为开展更大规模的行动”。<sup>④</sup>但这一请求并未获得批准,7月20日,莫洛托夫回复季米特洛夫:“同意中国中共中央的行动方针。关于弹药现暂勿做出许诺。”<sup>⑤</sup>随后,季米特洛夫向中共转达了这一答复。<sup>⑥</sup>

很快,中共再次提出了援助请求。1941年9月29日,中共中央致电季米特洛夫并转斯大林,表示中共决定创建情报部,其主要任务是探明日本人的军事政治工作和进行军事爆破作业,它能够在日本向苏联进攻时给予苏联帮助,为此希望援助爆破材料、设备和资金等。<sup>⑦</sup>根据当时的情况分析,估计苏联没有提供这些物资。首先,10月4日,苏联谍报员佐尔格从东京传来情报:苏联的远东地区是安全的,日本不可能发动对苏战争,日本将在几周内向美国开战。在确认东线安全的情况下,正全力投入到莫斯科会战中的苏联恐怕顾不上给中共援助。<sup>⑧</sup>其次,当时苏联对中共存有怀疑和不满的情绪。9月8日,中共刚刚再次婉拒了斯大林要中共派出部分正规部队和游击队到“南满”开展作战行动的请求。<sup>⑨</sup>对此,苏联和共产国际均表示不满,9月下旬至10月初,季米特洛夫两次致电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责问中共准备采取什么措施阻止日本进攻苏联?<sup>⑩</sup>在这种情绪下,刚

① 6月底,苏联通过驻延安工作组向中共提出关于协调行动问题和在日本进攻苏联情况下通过中共军队积极开展作战行动援助苏联的问题。7月,斯大林又致电毛泽东,希望中共抽调若干个旅或团摆在长城附近,阻止日军向北平、张家口和包头方向集结,要采取行动破坏通向上述地区的铁路交通。崔可夫也直接要求八路军大规模出动,配合国民党军队在中条山一带作战,以减轻日本对苏联东部的压力。A. M. 杜宾斯基:《苏联在日中战争时期(1937—1945)对中国人民的援助和中共领导的立场》,转引自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局编译处编《国外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研究论点摘编》,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204—205页;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213页;彼得·弗拉基米洛夫著,吕文镜等译:《延安日记》,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39—40页;周文琪、褚良如编著:《特殊而复杂的课题——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关系编年史(1919—1991)》,第387页;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9页。

② 《帮助苏联红军我们决取广泛游击战的方针》(1941年7月15日)。

③ ВКП(б), Коминтерн и Китай. Документы Т. V., №186, С. 547.

④ ВКП(б), Коминтерн и Китай. Документы Т. V., комментарии 1 к док №186, С. 548;季米特洛夫:《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第148页。

⑤ ВКП(б), Коминтерн и Китай. Документы Т. V., комментарии 1 к док №186, С. 548.

⑥ ВКП(б), Коминтерн и Китай. Документы Т. V., №188, С. 549;季米特洛夫:《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第149页。

⑦ ВКП(б), Коминтерн и Китай. Документы Т. V., №207, С. 567.

⑧ 雪梨编译:《间谍佐尔格》,《世界博览》2005年第7期,第83页。

⑨ A. M. 杜宾斯基:《苏联在日中战争时期(1937—1945)对中国人民的援助和中共领导的立场》,转引自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局编译处编:《国外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研究论点摘编》,第205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325—326页;ВКП(б), Коминтерн и Китай. Документы Т. V., №200, С. 557—558.

⑩ ВКП(б), Коминтерн и Китай. Документы Т. V., №205, С. 563;周文琪、褚良如编著:《特殊而复杂的课题——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关系编年史(1919—1991)》,第389页。



刚向中共援助了大笔资金的苏联很难再向中共提供援助。<sup>①</sup>

此后不久,由于得到日本可能进攻苏联的情报<sup>②</sup>,中共为配合苏联作战又提出了援助问题。1942年2月15日,毛泽东致电季米特洛夫指出:为了防备日本进攻苏联,我们正在扩大东北的力量。同时,我们正在准备在日苏爆发战争时进行爆炸工作,但我们没有威力大的爆炸物,也找不到掌握这些器材使用方法的老师。请苏联在这方面帮助我们。<sup>③</sup>2月22日,毛泽东又致电季米特洛夫强调,“目前日军再次对华北我游击区发动大规模进攻,似乎是进攻苏联的准备步骤。我军正与日军激战,以粉碎这次进攻”。<sup>④</sup>尽管毛泽东反复强调准备配合苏军作战,但中共希望提供炸药的要求并未得到满足,究其原因可能是:第一,此前斯大林希望中共配合作战的请求屡遭中共拒绝<sup>⑤</sup>,苏联和共产国际认为中共指望苏联胜利却不积极开展军事行动,2月27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通过决议不指名地批评了中共。<sup>⑥</sup>第二,这一时期苏联对中共的要求不仅限于“破路”,而主要是派正规部队和游击队配合作战。在这样的情况下,苏联很难向中共提供炸药等援助。

1942年5月,苏联派弗拉基米洛夫等人作为共产国际驻延安联络员兼塔斯社记者来延安工作。在有毛泽东等领导参加的见面会上,中共再次提出关于苏联提供武器弹药的请求,但未获明确答复。<sup>⑦</sup>

1942年7月斯大林格勒战役开始后,为得到中共支援,斯大林曾两次主动提出要向中共提供武器。当时,正在部署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苏联,得到不少关于日本将配合德国进攻苏联的消息。<sup>⑧</sup>在此情况下,斯大林希望中共能派兵支援。鉴于此前的几次请求均未实现,这次为得到中共的帮助,斯大林想以赠与武器为条件。据师哲回忆,斯大林致电毛泽东,要求中共抽调八路军一两个师的兵力到内蒙和外蒙边境地区,接受苏方提供的可装备一、两个师的新式武器。毛泽东研究后回电说:武器,我们自然是需要的。但调一两个师的兵力通过蒙古草原到达边境去接受武器却是不可想象的,因为敌人有空军,而我们没有。这样,我们的部队在未达到目的地之前,就会被敌机消灭掉。这个方案恐怕难以实现。过了一段时间,斯大林再次致电毛泽东,提出可否派出较小型的游击部队到满蒙交界地区轮番接受较小批量的武器,以加强抗敌力量。这一方案也被毛泽东否定了。<sup>⑨</sup>

派兵到蒙古接受苏方提供武器这一方案,在两年前曾受到中共极大的重视,那么此时毛泽东为何会拒绝斯大林主动提出的援助?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中共面临的形势发生了变化。1940年秋冬,中共面临的形势是严峻的:一方面,在日军的扫荡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封锁下,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出现了严重的财经困难。当时,国民党不仅彻底停发了八路军的军饷和弹药,还不断掀起反共高潮。因此,中共急需苏联的军事援助。另一方面,当时的交通情况尚好,中共有可能接收到武器。而时过境迁,1942年7月以后,国际国内局势已经发生很大变化。第一,在国际形势影响下,中国的局势有所好转。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形势逐渐朝着对同盟国有利的方向发展,国共关系也在转好,双方正在为此进行谈判。在这种形势下,毛泽东判断:“中国局势有好转可能,即亲苏、

① 关于资金援助情况参见孙艳玲《抗战期间苏联向中共提供资金援助问题初探》,《抗日战争研究》2011年第4期,第91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355、365页。

③ ВКП(б), Коминтерн и Китай. Документы Т. V, №220, С. 581—582.

④ ВКП(б), Коминтерн и Китай. Документы Т. V, №223, С. 585.

⑤ 除此前的几次外,1941年11月至12月间,当德军兵临莫斯科城下时,斯大林再次致电毛泽东,希望派一部分力量向长城内外发展,但毛泽东没有给以肯定的回答,只说部队调动有困难。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第213页。

⑥ 周文琪、褚良如编著:《特殊而复杂的课题——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关系编年史(1919—1991)》,第393页。

⑦ ВКП(б), Коминтерн и Китай. Документы Т. V, комментарии 4 к док №233, С. 602;彼得·弗拉基米洛夫:《延安日记》,第10页。

⑧ 《毛泽东致董、孔电》(1942年7月9日);ВКП(б), Коминтерн и Китай. Документы Т. V, №244, С. 615.

⑨ 此段未加注者均引自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第215页。

和共、政治改良。”<sup>①</sup>第二,中共的财政经济状况得到改善<sup>②</sup>,武器严重缺乏的情况也得到缓解。通过对日作战,中共军队缴获了大量日军武器,初步改善了装备低劣和不足的问题。<sup>③</sup>第三,交通异常困难。从根据地到“南满”,沿途遍布日本人的碉堡和飞机,蒋介石也作了种种军事部署以切断中共向外蒙古靠近,中共军队到达满蒙边境困难重重。<sup>④</sup>第四,中共开始积极发展对美关系,试图争取美国援助。最后,当时毛泽东已猜测到斯大林是想以武器援助为条件,争取中共采取军事行动配合作战。在中共境况有所好转的情况下,毛泽东不想为得到少量武器而去冒牺牲部队的危险。

此后至抗战结束,一些档案显示双方仍讨论过有关援助等问题。如据季米特洛夫日记记载,1944年11月30日,季米特洛夫与莫罗佐夫、潘友新等人讨论了蒙古共和国和延安之间的联系线路问题,认为这条线路是需要的,并责成他们作进一步研究并提出新的具体建议。<sup>⑤</sup>另据国民党方面的档案,1945年,延安由俄运到新式步枪400支,子弹60余箱,于1月7日交抗大七分校保存;同年4月,中共向俄购到新式轻机枪千余挺,弹药千余箱。<sup>⑥</sup>但是否确有此事,以及如何运到,还需要其他档案的充分证明。

此外,除了苏联的直接援助,新疆督办盛世才提供给中共的物资,其中大部分应该也来自苏联,因为盛世才的装备基本都是苏联援助的,有时可能就是苏联出钱、盛出名。<sup>⑦</sup>据不完全统计,武器援助大致有:1937年10月,盛赠送八路军的一批机枪;1937年底,滕代远从新疆返回延安时带回的高射机枪4挺、子弹2万发(也有说机枪12挺、子弹12万发);1938年1月,高自立携带皮衣、军火等10车经兰州办事处运往边区;1940年西路军余部返延时,除携带随身自卫武器外,还带机枪4挺、子弹4万发、日式三八步枪30多支等,作为送给朱德、彭德怀的礼物等。<sup>⑧</sup>

#### 四、小结

综上所述,根据现有的档案和有关材料可以肯定,抗战时期苏联确曾根据中共的要求秘密援助过机关枪、步枪、炮弹、手榴弹、子弹等武器和军事装备,援助主要集中在1940年以前,苏德战争爆发后这一问题更多地与苏联请求中共采取军事行动配合作战纠结在一起。与苏联给国民党的大量军援相比<sup>⑨</sup>,苏联向中共提供的武器援助在数量上确实极少。同时,与抗战期间苏联向中共提供的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399页。

② 关于这一情况参见孙艳玲《抗战期间苏联向中共提供资金援助问题初探》,《抗日战争研究》2011年第4期,第92页。

③ 据不完全统计,1943年中共缴获步枪共9.5万支,轻重机关枪2000余挺,手枪4000余支,反坦克炮29门,大炮73门,速射炮225门,还有两门高射炮等。艾格妮丝·史沫特莱著,梅念译:《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444—445页。

④ 《周恩来同志关于对反共高潮的估计致毛泽东同志并中央电》(一九四二年四月十八日)。

⑤ 季米特洛夫:《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第316页。

⑥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5编,“中共活动真相”(3),第70、81页。

⑦ 黄火青:《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与盛世才的关系》,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党史工作委员会、中共乌鲁木齐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第77页。

⑧ 陈秀玉:《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综述》,滕代远:《回忆赴新疆迎接红西路军和成立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情况》,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党史工作委员会、中共乌鲁木齐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第9—10、77、91页;《滕代远传》编写组:《滕代远传》,解放军出版社2004年版,第220页;谢觉哉:《谢觉哉日记》,第203、223页;李映光:《从新疆回延安》,《革命回忆录》增刊(1),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1页;萧潇清:《在新疆新兵营的日日夜夜》,《革命回忆录》(第13辑),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39页。

⑨ 关于抗战期间苏联援助国民党军火武器数量,中俄两国学者利用各自掌握的史料进行统计,得出的结果不尽相同,基本认同的是:飞机900余架,大炮1000余门,坦克82辆,机关枪近1万挺,步枪5万支,炸弹3万余颗,炮弹约200万发,子弹1.8亿发等。参见李嘉谷《合作与冲突——1931—1945年的中苏关系》,第98—99页;沈志华主编:《中苏关系史纲》,新华出版社2007年版,第61页。

上百万美元的资金援助相比,武器援助所起到的实际作用也有限。<sup>①</sup> 由于档案文献的局限,目前对苏联军事援助的考察尚不系统,还存在许多疑点。因此,笔者姑且通过对上述资料的整理,对这一问题作几点初步的分析:

### 第一,苏联援助数量极少的主要原因

苏联对中共的武器援助之所以非常有限,除了苏联和共产国际自身存在一定困难等客观因素外,主要原因有二:

一是苏联的对华基本战略考虑及其对国共两党的不同认识,导致中共不是苏联援助的主要对象。抗战时期苏联发展对华关系最重要的目的是让中国束缚住日本的手脚,使苏联避免两线作战。<sup>②</sup> 当时斯大林对国共两党的认识是:中共不够强大,在国内的地位尚不巩固,在抗战中发挥的作用不大,中共的民族主义倾向相当严重,国际主义团结感发扬得不够,指望苏联胜利自己却不积极开展军事行动,毛泽东永远也得不到美英这些大国的支持<sup>③</sup>;而国民党军队是抗战的主力军,蒋介石有苏联和英美盟国的援助,“即使不能打退日本的侵略,也能长期拖住它”。<sup>④</sup> 因此,苏联显然会把大量军援提供给国民党,而对中共的援助则是有限的。

二是国民党坚决反对苏联向中共提供援助,致使交通运输极其困难。蒋介石不仅多次拒绝苏联向中共提供武器援助的想法<sup>⑤</sup>,而且严密监视苏联在华人员,加强对根据地的交通管制,防止苏联以军用品、武器接济陕甘宁边区政府。国民党对苏联军运车队行驶区间的限制逐渐加紧,开始是不许超越兰州,后来又不许超越哈密,1940年和1941年先后派汽车团和空军人员直接在哈密接收苏联援华物资。到1942年前后限制更加严格:由兰去延飞机须蒋亲批,非经检查不得飞延;派胡宗南部队入甘肃控制西兰公路,调马步青骑兵军人康;企图检查苏联来华外交飞机,甚至还在兰州机场扣留苏联飞机一个多月,拒绝苏联外交飞机到重庆降落等。<sup>⑥</sup> 在国民党的坚决反对和严密监视下,运输是极其困难的,直接限制了苏联对中共的武器援助。

### 第二,武器援助对苏联与中共关系的影响

对于苏联在武器援助问题上的态度和表现,许多中共同志都感到失望、不解,甚至不满。一是国共有别、数量不足。抗战时期,延安出现了许多诸如苏联把“武器给了资产阶级,书籍给了无产阶级”的说法。<sup>⑦</sup> 当时,一些同志直接提出要求苏联援助武器的意见,表示了对这一问题的不满。如,1941年5月彭雪枫曾建议:“苏联之军火人力必须设法得到援助,王明同志等既能坐苏联飞机到延安,则以此飞机运输军火论,亦并非难事。苏日中立条约订立之后,在国际外交上之顾虑似已减少到最低限度。”<sup>⑧</sup>当然,这也不能排除另一种可能,即为了避免透露给国民党,中央尽可能地封锁消息和保守秘密,绝大多数中共同志并不了解武器援助的情况。二是苏联在提供援助时附带的

① 关于资金援助问题参见孙艳玲《抗战期间苏联向中共提供资金援助问题初探》,《抗日战争研究》2011年第4期,第82—93页。

② 瓦·崔可夫著,万成才译:《在华使命——一个军事顾问的笔记》,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36页。

③ 瓦·崔可夫:《在华使命——一个军事顾问的笔记》,第34—36页;ВКП(б), Коминтерн и Китай. Документы Т. V., №63, С. 302—310。

④ 瓦·崔可夫:《在华使命——一个军事顾问的笔记》,第34—36页;ВКП(б), Коминтерн и Китай. Документы Т. V., №63, С. 302—310。

⑤ 如,1939年9月3日,蒋介石自重庆明确电告正在莫斯科的孙科:“如再有人提议以俄货直接由俄接济共党之说,请兄严词拒绝,切勿赞同。以军事胜败全在统一,不能受外国直接接济,否则抗战不惟无益,而且国家必亡也。”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3编,“战时外交”(2),第427—428页。

⑥ 《周恩来同志关于对反共高潮的估计致毛泽东同志并中央电》(一九四二年四月十八日)。

⑦ 奥托·布劳恩著,李逵六译:《中国纪事(1932—1939)》,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286页。

⑧ 《彭雪枫同志对目前国共斗争形势的分析及对蒋介石斗争策略的建议》(一九四一年五月三日)。

条件和要求,也使中共非常无奈。对于这些指示,无条件地执行可能会给中共带来损失,婉拒则会引发苏联和共产国际的不满甚至批评。因此,这些因素多少都会对双方关系产生一定影响。

### 第三,关于苏联武器援助存在的疑问

由于档案文献的缺失和模糊,目前对苏联援助中共武器问题的考察还存在许多疑点和问题,主要有两点:一是关于档案材料,从目前我们掌握的资料来看,很多是间接的,同时很多援助都找不到多个可靠的证据。最关键的一点是,至今我们都没有在中共正式文件中找到有关中共得到苏联武器援助的蛛丝马迹,这就对研究的可靠性提出很大挑战。二是援助本身,我们既做不到对援助数量、种类等做准确的统计,也不清楚中共如何分配、使用这些武器。总之,本文的研究还是初步的,笔者期待更多档案材料早日公布,能使这些疑问得到解答,从而对武器援助问题展开进一步研究。

[作者孙艳玲,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徐志民)

## 《抗日战争时期人口内迁研究》出版

程朝云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6月出版,23.1万字,28元

程朝云的《抗日战争时期人口内迁研究》一书,以全面抗战爆发以后的战区、沦陷区人口向后方的迁移为研究对象,该书鉴于学界目前对战时人口迁移的研究大多偏重于某一方面、或局限于某一特定地域的现状,重在对战时人口内迁问题作整体性研究。作者充分借鉴前人研究成果,在大量占有和考证原始史料,尤其是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相关档案史料的基础上,通过对档案、报刊杂志、各种资料集、回忆录、当事人日记等的反复甄别、推敲,对战时人口内迁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该书细致地梳理和论述了抗战时期人口内迁的背景、构成、规模与分期、过程与具体路线,战时内迁人口在后方的分布与生活就业状况,战时内迁人口对抗战的贡献、对迁入地的影响,战时内迁人口的个体生命体验以及知识分子奔赴陕甘宁边区等问题,在一些问题如难民定义、人数、人口内迁的分期上多有创新,作者认为战时难民从狭义上来理解,大体涵盖了除随政府机关、学校、工厂有组织地迁徙以外的所有战时迁移人口。关于难民的人数,作者通过对统计数据的细致分析,令人信服地指出战时人口内迁的规模应在1000万人左右。关于人口内迁的分期,作者认为应划分为初期(抗战爆发到1939年底)、中期(1940年至1943年底)、后期(1944年到抗战胜利)三个阶段。该书从人口迁移研究和抗战史研究的双重视角出发,在宏观展现人口内迁运动的同时,力求使“人口”这一概念立足于鲜活的“人”,使抗战中每个“人”的真实感受得以体现,如此我们更加明白了战时人口迁移与抗战的关系,了解了抗战时期中华民族为争取个体乃至民族的生存所做的艰难而不屈的抗争,对《中国复兴枢纽——抗日战争的八年》一书中提到的“不同状况、不同方向成亿人口的迁徙运动形成了中国民族浩浩荡荡的有形的觉醒运动的一种形式”进行了论证和补充。(教凯)